

---

#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企发展 与改革的突破及启示 ——以四川省为重点

蓝定香 王晋<sup>1</sup>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四川成都610071)

**【摘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中国国企发展经历了起步性发展、改革中发展、高质量发展三个阶段, 实力不断增强。四川国企对中国国企改革阶段的发展具有典型意义, 他们率先开展了国企扩权、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放小”改革等改革实践。国企在改革中加快发展的突破与经验, 为我国未来深化国企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解放思想是前提、“问题导向”是出发点、先试点后推广是基本方法、综合施策是重要条件、理论与实践结合是重要支撑、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

**【关键词】**: 新中国成立70年 国企发展 国企改革 四川实践 创新精神

**【中图分类号】**F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86 (2019) 08-0006-0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从中国(绵阳)科技城市建设透视军民融合发展的多重体制障碍及其突破研究”(16XJY001)。

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我国国企发展走过了70年的光辉历程。回首日新月异的70年, 中国国企发展与改革的成效显著; 面向继往开来的新时代, 中国国企的发展与改革仍然大有可为。不论是总结过去, 还是展望未来, 人们大都会将目光投向一个内陆省份——四川, 中国国企持续发展的动力来自改革, 而中国国企的改革为什么会发端于四川, 并且往往是四川国企在扩权、现代企业制度试点、“放小”改革等许多领域率先突破? 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梳理与回答, 并为我国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推动国企高质量发展提供启示。

## 一、文献综述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国的国企经历了70年的发展历程, 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 国企经过4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 获得了巨大成就, 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归纳起来, 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关于中国国企的产生与发展。杨卫东认为, 国企存在于各类国家, 它的诞生几乎与工业文明同步<sup>[1]</sup>。刘中桥经过从中国、西方国企发展比较的角度研究后认为, 中、西方国企是社会经济运动和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它们的产生和发展有

---

<sup>1</sup>**作者简介**: 蓝定香(1966—), 女, 汉族, 四川省中江县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理论; 王晋(1975—), 男, 汉族, 四川省罗江县人,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 企业管理理论、区域发展理论。

着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sup>[2]7</sup>。中、西方国企产生的生产力条件有着天壤之别<sup>[2]11</sup>。

二是关于国企改革的原因及困难。陈永忠认为，国有制存在严重的弊端，在国有制基础上不能正确处理国家与企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个人三者的利益关系，现在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sup>[3]</sup>。胡兴旺认为，国企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包括：国资国企改革动力不足，国家层面国企改革总体方案不明确，改革环境有待优化，社会认知尚需统一<sup>[4]</sup>。刘灿、韩文龙认为，国企改革有五大困境，包括政府和国企关系的困境、国企性质和定位的困境、国企公司治理的困境、国企企业效率的困境和国有企业利益分配的困境<sup>[5]</sup>。

三是关于国企改革成功标准。路风认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内部组织革新，并提出“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认为国企缺乏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层从来没有有效控制生产过程，因此，国企的发展前景取决于管理者实现这种控制的努力程度<sup>[6]</sup>。林毅夫则主张，提高国企的自生能力是改革成功的首要条件，而企业自身能力问题源于违背资源禀赋的赶超战略<sup>[7]</sup>。

四是关于国企改革的阶段。王忠禹等认为，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扩大经营自主权阶段；第二阶段，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之前的制度创新和结构调整阶段；第三阶段，以党的十六大为开端的以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阶段<sup>[8]</sup>。张卓元等则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三十年分为两大阶段，前十五年主要是进行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立的改革；后十五年重点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和公司制改革<sup>[9]</sup>。

五是关于国企改革的路径。范恒山认为，国企改革必须贯彻结构调整、制度创新的思路，研究和推进国企改革和改组问题的解决<sup>[10]</sup>。刘谷庭指出，国企深化改革的思路选择在于制度创新基础性工作，包括投资主体多元化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现代化<sup>[11]</sup>。宋磊主张，国企改革的关键是依照市场经济的法则，隔断国企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把国企改造成成为真正的具有预算硬约束的企业，并提出从前端、中端和末端三个环节进行改革<sup>[12]</sup>。金碚认为，每个国企改革都应围绕如何经营更有效率以及如何做出让全民和国家更满意的贡献展开，并提出国企应该以营利方式实现全民目标、确定可行的技术路线推动技术创新以及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作用<sup>[13]</sup>。

虽然研究国企改革成果比较丰富，但全面系统梳理分析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企发展与改革的历程、动因及启示的论著较少，尤其是从内陆省份四川这个特定地域视角来探索中国国企改革的缘起、进展与启示的成果尚未搜索到，亟待研究。

## 二、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国企发展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国企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

### （一）起步性发展：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以前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包括国有制的转变，形成一些国企。随着“一五”时期和大规模“三线”建设等经济建设的不断推进，国企得到了巨大发展，分布的领域也日益广泛，几乎囊括了包括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粮店、理发店、餐饮店等在内的所有领域，为社会主义建设、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作出了重大贡献。不过，随着发展的深入，量大面宽的国企发展活力越来越差，亏损的企业也越来越多，部分企业甚至陷入困境。最终，于1978年开始进入以改革促发展的新阶段。

### （二）改革中发展：1978年10月到党的十八大以前

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放权让利”“制度创新”“布局调整和结构优化”等几个阶段的改革，绝大部分国企的内在活力被

---

激发出来，经营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公司治理结构逐步规范，初步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不断发展壮大。在2018年7月发布的《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中，中国仅中央企业就有48家上榜，而且前4位中有3家都是中国的中央企业。

### （三）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十八大以来、十九大以来，全国国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主动适应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新要求，着力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引领发展、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等方面下功夫，朝着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向不断迈进。

## 三、中国国企改革的动因与四川的率先突破

究竟中国国企为什么要改革呢？其直接原因是国企内在活力不足，亏损严重。其深层次原因是国企的国有国营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 （一）国企改革的动因

1978年，中国国企之所以开始改革，最为根本的原因是：过去国企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政府行政机构的附属物、“算盘珠”，政府拨一拨，企业才能动一动，上边推一推，下边才能走一走，没有自主权，缺乏内在发展活力和动力，导致国企大面积亏损，不少国企陷入困境而难以自拔。有资料显示，1956—1977年期间，国有企业固定资产原值的增长幅度（9.2倍）远超利润总额增长幅度（5.5倍），投入产出严重不匹配<sup>[14]</sup>。就四川来看，“当时（1978年）四川的国营工业企业，从固定资产的总量来说，已居全国二十九个省市中的第二位，但产值却是相当低的。因此，要恢复和发展四川的工业，必须首先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企业的生产力。从这个认识出发，四川选择了从扩大企业自主权入手，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的道路”<sup>[15]</sup>。

### （二）四川国企改革的率先突破

四川国企改革的大胆探索和率先突破较多，限于篇幅，这里仅从三个方面的典型案例来分析。

#### 1. 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

为了摆脱国企经营状况每况愈下的困境，借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基层单位积极性”的成功经验，在1978年10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之前，四川省委省政府敢为天下先，推出宁江机床厂、重庆钢铁公司、成都无缝钢管厂、四川化工厂、新都县氮肥厂、南充丝绸厂等6家国企进行扩大经营自主权的试点，给这些企业分别定出当年增收的目标，允许它们在年终实现目标后，提留少量利润给职工发奖金，以此拉开了国企改革的大幕。

受到四川改革试点政策的激励，尤其是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性决策的鼓舞，6户试点国企大胆探索，努力创新企业的产品销售和生产经营机制。其中，四川宁江机床厂由于其产品被当时的物资部门定位为“长线积压产品”，在指令性计划和“统购包销”的体制下，其产品销售十分困难，生产经营陷入困境。为闯出一条生路，该厂时任厂长刘伦宝四处游说，希望能够刊登产品广告，但许多报纸都不敢“冒险”刊登。经过不懈努力，其终于在1979年6月25日的《人民日报》刊登了（见图1），打出了全国第一个生产资料广告。这在当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思想认识的平静湖面上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激起了千重浪花，掀起了轩然大波。当时，有个部门领导质问刘伦宝厂长：“你懂不懂马列主义？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社会不是商品，这是马克思说的。”<sup>[16]</sup>虽然那则广告令全国哗然，争议四起，甚至冒“政治风险”，但使宁江机床厂

的产品从物资部门的“长线积压产品”转眼间变成了抢手货，订单纷飞。时任厂长刘伦宝说，“广告见报后不到两个月，宁江机床厂已签订了1300台机床的供货合同，相当于原来全年产量的两倍多！”<sup>[16]</sup>



图 1 宁江机床厂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广告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1979年6月25日

实际上，宁江机床厂在《人民日报》刊登第一个商业广告的意义远非订单增加这么简单，而是在当时向全国人民倡导了“生产资料是商品”，完全可以采取供需直接见面、减少物资部门计划采购的中间环节等市场经济思维，让企业一下子找到了“市场活水”，为企业搞活注入了不竭的原动力。为了冲破传统观念和认识羁绊，平息当时对于该广告事件的巨大争论，倡导新思想、新认识、新理论，《人民日报》8月5日在头版头条以“产销直接见面供需双方满意”为题刊发了正面报道（见图2），并配发了专门的“编者按”，引起了各方高度关注和肯定。宁江机床厂刊登广告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国企通过放权让利改革，激发了其研发产品、加快生产、开拓市场、获取利润的内在积极性，为四川乃至全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探明了方向、探索了路子。宁江机床厂敢为天下先的改革创新精神被载入了我国的改革史册，引领我国国企改革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图 2 《人民日报》刊登的关于宁江机床厂广告评论

图片来源：《人民日报》，1979年8月5日

由于6家国企扩权试点效果出乎预料地好，“当年（1978年）年底，在总结初步经验、反复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四川省委省政府果断决策，再接再厉、乘势而上，制定了《关于扩大企业权利，加快生产建设步伐的试点意见》（简称“十四条”），“并决定从1979年起把试点范围扩大到一百个企业”<sup>[17]</sup>，而且扩权的内容也更加丰富，更加有力。“十四条”的核心就是在保持经济管理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国企在完成国家计划和各项技术经济指标后，除了允许其实行利润提成、超产奖励之外，还允许其从企业基金中提取一定比例的奖金发给职工。从企业基金中提取的奖金数额根据不同国企经营好坏而有差别<sup>[18]</sup>。这样，就初步把国企的经济责任、经济效果和经济利益结合起来了，把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的利益结合起来了，调动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使职工更加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也使管理者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增加职工收入的责任，从而取得了生产发展、利润增加、生活改善的良好效果。

“十四条”成为全国国企改革的重要历史文件，引领了全国国企扩权让利改革。“四川的改革试点得到多地的效仿和中央的肯定。”<sup>[14]</sup> 1979年5月，国家经委等部门牵头进一步选择首都钢铁公司、北京清河毛纺厂、天津自行车厂、天津动力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汽轮机厂等京津沪的8家企业进行扩权改革试点。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5个文件，明确了企业应该具有生产计划权、产品销售权、利润分配权、劳动用工权、资金使用权、外汇留成权及固定资产有偿占用制度等<sup>[14]</sup>。直接参与四川国企扩权改革试验的四川省社科院的林凌等一批研究人员后来也参与到首都钢铁公司的改革研究工作中。“1981年，林凌与蒋一苇带领四川社科院经济所和中国社科院工经所的科研人员到首都钢铁公司研究企业承包经营责任制。他和蒋一苇写给国务院的建议被采纳，推动了企业改革由扩大自主权向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深化。”

[19]

## 2. 率先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

股份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但是，中国学术界和实践部门对于股份制的认识却经历了较长的纷争过程。最初，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将股份制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股份制和公有制是格格不入的，只有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搞股份制。直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股份制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才第一次正式肯定股份制在中国的地位，实现了认识上、理论上的真正突破。

不过，四川早在1980年就公开发行了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支股票，成立了我国第一家股份公司。1980年，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即蜀都大厦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为了建造蜀都大厦，对外公开发行了股票，每股面值1万元，成功募资修建了当时成都的地标性建筑——蜀都大厦，也打响了全国股份制试点的第一枪（见图3）。1986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正式开展股份制试点，先后出台了《关于国营大中型企业股份制试点意见》《关于扩大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股份制试点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对股份制试点的指导思想、目的、原则以及股权划分、股益分配、组织管理都作出了规定。当年，四川自贡铸钢厂和重庆嘉陵机器厂等国企率先进行股份制试点。此后，自贡长征机床厂、峨眉山盐化公司、自贡东方锅炉厂等50多家大中型国企相继开展试点。四川全省各地、市、州和部分县区也推出了一些股份制试点企业。



图3 成都市工业展销信托股份公司的股票

图片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f8c26b0100kbe9.html](http://blog.sina.com.cn/s/blog_67f8c26b0100kbe9.html)；[http://www.997788.com/s\\_51\\_15138746/](http://www.997788.com/s_51_15138746/)。

最值得提及的是，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在四川自贡召开了全国首次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该会深入讨论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还很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利用股份制的形式加快和深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大中型国企的改革，以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等问题，为全国扩大股份制试点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指导。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国际形势剧变的影响，国内各界对于股份制试点的争论进一步激化。许多学者认为，股份制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采用。与此同时，我国经济也开始进入三年“治理整顿”时期，股份制试点遇到曲折，进入低潮，在有的地方甚至成为“禁区”。四川省股份制试点工作虽然也受到一定影响，但是理论界的探索仍在大胆地继续。这期间，林凌、蒋一苇、赵国良、郭元晔等专家学者撰写了大量关于股份制的理论文章，发表在《经济体制改革》等重要刊物上，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中，曹振镛撰文《也谈全民所有制企业推行股份制——与林凌、蒋一苇、赵国良、郭元晔同志商榷》发表在《经济体制改革》1989年第1期上。反对方与支持方展开了持久的争辩。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陈永忠同志也于1991年2月“冒险”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研究》，西南财经大学赵国良教授为其撰写的书评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1991年第11期上。由于具备有力的理论指导和良好的实践基础，1991年下半年四川的股份制试点先于全国开始重新受到重视，四川省政府作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股份制试点的决定》，继续推进全省股份制企业的试点工作。

### （三）率先进行国企“放小”改革

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把国有企业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结合起来。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强调国企改革要“坚持‘抓大放小’”。“抓大”，就是要求国有资本向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重点行业的大型企业集中；“放小”，就是放开搞活中小型国企。而四川放开搞活中小型国企的“放小”改革早在1991年就开始探索了。

从动因来看，20世纪80年代，对县属国企放权让利减税、承包租赁经营等改革虽然收到了一些效果，但企业发展无动力、经营亏损加剧等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既制约了四川国企的生存和发展，也严重影响到全省地方经济的发展。到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县属国企亏损面高达80%以上，有2/3左右的县为财政赤字县，4/5以上的县不能按时发放工资。为摆脱困境，四川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宜宾县开展县属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封闭试点。

那么，四川县属国企封闭改革试验为什么会选择宜宾县呢？一方面，当时宜宾县县属国企的经营状况总体上比较困难，倒逼政府推动改革。1990年，宜宾县66户预算内国企的负债率超过85%，亏损面高达70%，亏损额超过4000万元，县级财政赤字不断增大<sup>[20]</sup>。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难以承受重负。另一方面，四川省委省政府面对全省县属国企经营困难的严峻形势，必须寻求突破，而当时的宜宾地区（1996年改为宜宾市）及宜宾县委县政府“敢闯敢干”，愿意“吃螃蟹”。就这样，四川省委省政府在宜宾地区的全力配合下，决定在宜宾县率先进行封闭改革试验。

宜宾县县属国企封闭改革试验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和理论准备。宜宾县委县政府“一班人”通过大量的深入调查发现，产权改革是关键。若不改革产权，理清产权关系，政府与国企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就难以理顺。一方面，国企无独立支配的财产权，无法自负盈亏；另一方面，国企的重大决策甚至劳动人事分配关系又主要由政府说了算，导致国企吃国家的“大锅饭”、职工吃国企的“大锅饭”，国企越吃越穷，职工越吃越懒，主人翁意识越来越淡薄。挖出国企“顽疾”根源之后，宜宾全县上下又认真学习了相关政策文件，特别是展开了多次改革大讨论，最终形成了突破性共识——“改到深处是产权”。从此，宜宾县迈上了“改革产权、搞活企业”的创新征程。

宜宾县县属国企封闭式改革试验方法多样、成效显著。1991年7月，宜宾县粮油贸易公司成为第一个由承包经营转股份合作制的改革试点企业，拉开了县属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序幕。1992年5月，宜宾县召开了“全封闭”会议，深入学习邓小平南方谈话，引导人们切实转变观念、厘清认识，在进一步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宜宾县小型国企产权改革由点到面，全面推开。

宜宾县委、县政府在推进小型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坚持了“先立后破，统一政策，规范运作”的原则，采取了边改革试点，边总结经验，边完善政策的做法。县委县政府先后制定了《关于加快改革步伐的决定》《宜宾县企业产权制度改革试行办法》《宜宾县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办法》《宜宾县国有净资产承包（租赁）试行办法》《关于加强中介组织在股份制企业中的作用的通知》《宜宾县股份制企业审计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文件，对县属国企产权改革的组织实施、基本方法和原则、资产评估、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等问题进行了明确具体的规定，使宜宾县县属国企产权改革能做到“有法可依”。

宜宾县的改革试点得到四川省委省政府的肯定并不断深化，效果日益凸显。经过短短两年的改革，到1994年，宜宾县国企的情况大为改观，许多改制企业实现扭亏为盈，国有资产盘活增值，财政收入大幅提高，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

宜宾县县属国企改革取得的经验很快得到了推广。1994年，四川省委、省政府在宜宾县召开了县属企业改革现场工作会，总结和肯定其经验，并在此后几年连续在金堂、射洪、成都、宜宾、营山等地隆重召开了全省县属企业（中小企业）改革工作会，提出了“面上推广”“深化改革”等要求，全力推动全省县属企业、中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同时，从总结推广宜宾、射洪、金堂等县的改革试点经验入手，坚持不懈地探索搞活国有小企业的新路子、新办法和新经验，对成功的经验及时加以总结

---

推广。其中，有3条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一是抓住深化国有小企业改革的关键，坚持以产权制度改革为突破口，推进资产重组和机制转换，力求从根本上真正搞活国有小企业。二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企业改制的形式和做法以及搞活企业的经营方式上，坚持因地制宜，一企一策，分类指导，对症下药，不搞一刀切，不搞一个模式，放手让各地去探索，在全省不同的地区形成各具特色、优势突出的改革典型。三是对看准了的改革措施和改革办法，少争论多实践，为改革的不断深化创造了宽松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

## 四、国企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新中国70年国企的发展与改革，尤其是四川率先改革的创新精神，给我国未来国企深化改革与发展带来了许多重要的启示。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 （一）解放思想是前提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解放思想是推动国企改革与发展的第一动力。只有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才能把握大势，抓住机遇，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四川国企改革能够率全国之先，最为首要的经验就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国企生存发展的困难症结、人民生活所提出的市场需求出发，坚定地推进国企改革。例如，关于生产资料究竟是不是商品、能不能由企业自己销售，股份制能否在国有（公有）制企业推行，县属国企能否退出国有、是否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等，在当时均是争论十分激烈的问题，而四川干部群众从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次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予以转载等等“思想解放盛宴”中品味其精髓、领会其鼓励“冒险”、大胆创新的实质，大胆试验，不断推进国企改革。

### （二）“问题导向”是出发点

中国国企为什么能够不断发展壮大，是因为改革解决了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为发展注入了动力。回顾新中国成立70年国企的发展与改革历程，可以发现，国企改革始终以问题为导向，每次大的改革举措出台和理论突破，都与“问题倒逼”相关。为了解决旧体制对国企的约束，改变国企利润增长缓慢的问题，选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允许国企在实现年终目标后，对剩余的利润进行自主分配；为了解决企业增收、国家没有多得的问题，理顺国家与国企的分配关系，选择两步“利改税”改革；为了实现国企自负盈亏，增强其经济责任，进行“两权分离”经营改革；为了激发国企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进行转换经营机制改革；为了让国企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大胆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了强化激励约束机制和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党的十八大以来，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推进混合所有制、治理结构调整和“三项制度”改革。

### （三）先试点后推广是基本方法

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其改革是前无古人之事，无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只有先试验，发现成功典型、取得成功经验，才能逐步推广，以便降低风险。国企扩权改革从四川宁江机床厂等6户企业逐步扩大到100户企业、扩权内容从简单的提取适当利润到利改税进而承包制、大中型国企从试验股份制到探索现代企业制度再到全面推行现代企业制度直至不少企业股票公开发行上市、从四川宜宾“放小”改革的封闭试验到四川全省连续多年召开其经验推广现场会乃至山东、江西等各省推广其经验、从各个省市的改革试点到全国性政策制定和面上推广等等，无不证明先试点后推广的策略是非常正确的，有利于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减小了风险。

### （四）综合施策是重要条件

国企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一方面，国企改革不仅涉及思想解放、观念转变、理论创新、社会舆论等“虚”的方

面，而且涉及党政干部“冒险”、国资管理体制、与国家既有政策冲突等许多实际的问题，触及的利益主体也很多，因此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不能单兵突进，而要系统推进。国企在一系列的大胆探索改革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支持，相关部门全力配合，且营造了“早改主动、晚改被动”“改革无坦途、不改无出路”等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才取得了试验的成功。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看到，曾经作为国企改革“先锋”、发展“标杆”的一些企业后来相继衰退甚至失败。这就充分说明，国企不能一改了之，不是一改就灵，更不能一改永逸，而是要与时俱进、综合施策，全面推进观念转变、改革深化、战略转型、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市场开拓，才能持续发展，做大做强做优。

#### （五）理论与实践结合是重要支撑

推动国企改革与发展，实现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是一个全新的历史课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在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重视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有机结合，善于将实践中的成功做法和经验总结提炼，上升为规律性认识和科学理论，又反过来指导实践，实现理论与实践互动互促，是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经验。回顾中国国企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在改革最关键的阶段，都产生过大胆的理论探索。其中，“实践催生理论”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国企的扩权改革试点。一方面，一大批学者将在扩权改革试验中取得的经验进行总结，及时向国家相关部门报告，获得认可，并将其不断扩大到全国的国企；另一方面，催生了国企的“两权分离”理论乃至后来的现代企业制度理论。而“理论指导实践”最具典型意义的则是“股份制理论”。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股份制试点遇到曲折、进入低潮之际，林凌等一大批学者扛起了“股份制”大旗，坚定支持国企继续开展股份制试点，主张从承包制过渡到股份制。他们的理论探索后来被广泛应用到全国大中型国企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并在国家层面形成了统一认识，最终催生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理论。此外，中小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的实践探索，使得一大批国有中小企业退出了“国有”，催生了国有经济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及国有资本优化配置的理论。因此，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创新相结合，才能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国企改革不断深化，推动国企转型发展、科学发展、高质量发展，甚至进一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

#### （六）党的领导是根本保障

加强国企的党组织建设，坚持党对国企的全面领导，是国企的“根”和“魂”，是推进国企改革深化、发展壮大的根本保障。在国企发展与改革中，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坚持把党的领导与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机统一起来，才能保障国企发展与改革的正确方向。纵观新中国70年国企发展与改革的进程可以看到，坚持党对国企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重大改革方向。把坚持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统一起来，关键就在于把党的领导写入公司章程、融入公司治理的各个环节，明确党组织在国有企业决策、执行、监督各环节的权责和工作方式，使党的领导作用发挥组织化、制度化、具体化。

#### 参考文献:

- [1] 杨卫东. 国企新策丛书 [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4.
- [2] 刘中桥. 中西方国有企业发展比较研究 [N].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 7.
- [3] 陈永忠. 中国社会主义股份制研究 [N].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2: 107.
- [4] 胡兴旺.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问题及对策 [J]. 财政研究, 2014 (10): 61-64.
- [5] 刘灿, 韩文龙. 国企改革的困境及出路: 基于动态关系治理的新视角 [J]. 当代经济研究, 2014 (2): 33-39.

- 
- [6] 路风. 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 [J]. 中国社会科学, 1989 (1) : 71-88.
- [7] 林毅夫, 刘培林. 自生能力和国企改革 [J]. 经济研究, 2001 (9) : 60-70.
- [8] 王忠禹. 深化改革、科学发展, 推进企业现代化建设 [J]. 现代企业, 2008 (11) : 4-5
- [9] 张卓元. 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回顾与展望 [J]. 企业文明, 2008 (1) : 21-24.
- [10] 范恒山. 国有企业改革三论 [J]. 新长征, 1995 (7) : 22-24.
- [11] 刘谷庭. 国企改革的现状及出路 [J]. 江西省人民政府公报, 1997 (19) : 19-21.
- [12] 宋磊. 在理念与能力之间：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第三种思路 [J]. 经济学家, 2014 (8) : 43-51.
- [13] 金培. 新常态下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方向 [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2) : 1-6.
- [14] 程俊杰, 张敏, 黄速建. 改革开放四十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演进与创新 [J]. 经济体制改革, 2018 (5) : 85-92.
- [15] 林凌.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4: 4.
- [16] 金小明, 李南玲. 轻舟正过万重山——自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发祥地四川的报告 [J]. 瞭望, 1987 (40) : 27-29.
- [17] 靳延. 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对建国以来四川省经济体制的演变及其经验教训的探讨 [J]. 经济体制改革, 1983 (1) : 16-27.
- [18] 林凌. 林凌文选——改革三十年亲历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170.
- [19] 郭元晞. 改革先驱学术泰斗——深切缅怀良师益友林凌 [J]. 经济体制改革, 2018 (4) : 6.
- [20] 中共四川省宜宾市委宣传部企业改革课题组. 宜宾市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的调查与启示 [J]. 经济体制改革, 1999 (1) : 56-63.

## 学者风采



蓝定香，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经济学博士，研究员，硕士生导师。自1990年工作以来，先后在《中国工业经济》《社会科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和出版著述90余篇（本）（含合作）。其中，独著专著1部（《西部国有大中型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4项、四川省软科学课题2项。科研成果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10余项。学术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光明日报》《经济学文摘卡》《中国经

济学年鉴》、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16篇（含部分）。2006、2014年两次获“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称号；2009年获“四川省三八红旗手”称号。